

欧洲和中国的互动及合作将会稳步增加

记者：庄翠芬



Niels Thygesen

于丹麦经济事务部工作，并于哥本哈根大学担任副教授一职。他先后担任马来西亚财政领域的经济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货币部部长。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后来成为哥本哈根名誉教授、丹斯克银行（Danske Bank）国际经济教授。

「中国经济的大幅增长将在未来引发巨变。中国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经济部门，而同时也开始改善人力资本和研发部门。」

记者：在 2013 年，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并发表了一个演讲。您在当时谈到欧元的问题，并提到现在需要就其采取一些措施。您是否可以向我们简要阐述下该话题？您是否认为在两年后的现在，其情况已经改善了呢？是否有什么变化？

Niels Thygesen：今天，我可以和你简要地谈谈我在 2013 年所做的事情。自从那时候起，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一直都存在的问题是，其结果将是什么？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一直保持某种形式的乐观心态。我想，欧盟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在欧洲的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金融问题上。我们现在拥有银行业联盟，而这意味着会在欧盟施行一些安全规定，而在这个领域内，在政治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当前存在集中发生在希腊的危机。如果观察一下两年前的例子，当时好几个国家都处于危机中，这个问题将会更加清楚。所有这些国家都幸运地重新回归到了市场中，除了塞浦路斯共和国。西班牙已经避免陷入真正的危机中。希腊现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但是希腊很可能将会一直处于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将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这些

问题可以被解决。而在经济上，如果脱离欧盟，那么对希腊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而我们其他人将会承受这些结果，但是并不必然是一场灾难。

记者：您也在香港 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做了主题为“欧元区货币制度：是欧盟的催化剂还是破坏球？”的演讲。您对这个话题持有什么观点？若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Niels Thygesen：是的，我也在 2013 年来到了位于香港的 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当时处于较大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在那次出差中，我也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我不认为现在那个所谓的破坏球还存在。情况已经改变了，而且我认为，并且同时也看到，欧盟和中国在一起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们在欧盟所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是，乌克兰危机，以及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与此同时，我们尚未准备好解决方案，不过至少我们看起来好像准备好面对该挑战了。同时，这必须是欧洲共同的问题。对共同对外政策的关注已经增加了，而这也反应在了欧盟成员解决其经济问题的能力上。

记者：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您在丹麦还参加关于国际经济和欧盟一体化的研讨会。您对亚洲的发展是如何看待的？特别是在国际化和全球化成为亚洲快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背景下，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有多大？它究竟是一个快速还是缓慢的进程？

Niels Thygesen：当然了，亚洲经济与欧洲经济相比，前者发展得更加快速。“一般的“欧洲国家每年增长 1-2%。而在中国，经济仍然保持每年 7% 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不再基于对相对低技术水平劳动力雇佣的增长——而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来自于更高的生产率。当然

了，其他国家想要在中国投资，并在新的经济部门中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发展。这同时也应当增加亚洲的重要服务。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经济将会增长，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将资本从传统产业中转移到私营部门，而私营部门中有很多极具希望的新技术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我认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而中国的一些经济部门和地区将与世界经济在金融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对于将会出现的资本流入，则无需加以限制，并且该资本流入还可以被用于支持高投资率。你不能说“亚洲经济”增长那么快，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依赖于全球市场的。但是，东南亚国家现在发展的很不错，同时印度也变得更加重要，尽管其起点很低。总而言之，需要区别对待亚洲国家之间的不同情况。

记者：您认为基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欧洲的公司和组织会在将来出现什么趋势？中国是增值链的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这是否是欧洲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否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原因？

Niels Thygesen：关于这个问题，我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趋势就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工业和贸易以及投资部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欧洲因素。我认为，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的经济。德国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国家。他们有很多企业集团在生产用于中国发展的投资品。中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好，并且德国经济也很稳定。我昨天在北京跟丹麦驻华大使共进午餐。他谈到，丹麦是唯一一个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方面做得跟德国一样成功的欧洲国家。我们的很多重要公司在中国的表现也很抢眼；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挑战等方面便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丹麦在中国的这些领域内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在很多领域被视为高效率的生产商；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各种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但这一因素得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很多欧洲公司由于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的原因而正在向中国供应商品。所以欧洲企业将会继续来中国发展，而相对优势的公司将会努力雇佣高素质的

中国员工。中国人民所接受的教育质量越来越高。人力资本很高，因为现在中国的其他资源有更高的优先级，并且人力资本正在以比我们在欧洲所能观察到的更高的速度在增长。

记者：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沟通壁垒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企业必须要克服这个障碍才能高效地合作。同时，文化差异也引起了各种问题。您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您认为，这两大洲之间的互动会引起很多问题，还是说，文化和语言壁垒很容易克服？

Niels Thygesen：沟通和语言障碍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去上海之前，我在北京停留了几天，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员俱乐部，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大学，且该大学国际化程度最高，有很多外国客座教授。但是，即使在那里，那些员工并不怎么会说英语。学生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讲英语，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中国人来说，英语发音是很困难的。当然了，跟我们学习汉语的困难程度是一样的。但是，我在上海论坛遇见一些从丹麦来的朋友，并和他们共进了午餐，他们现在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他们几年前开始学习汉语，而现在他们的汉语很流利；在语言上进行大量投入显然是值得的。除此以外，我认为文化差异并不是很重要。中国人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显然，他们有很好的幽默感，而且，他们也有着良好的好奇心；即使在由于语言的原因而导致他们并不是非常理解对方的时候，他们仍然尝试理解，并能快速地把握住语境。

记者：中国正在扩大研发部门（R&D），并且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的制造业。特别的是，中国的人力资本这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提升。您是否认可中国对全球创新和技术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Niels Thygesen：这个问题很好地反映了我所要说的。中国不再仅仅关注于低成本产业，

而是关注于高附加值产业。质量已经得到了提升，而且，我认为中国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在高科技领域做的非常成功的中国企业。并且，针对吴教授在今天早上做的关于金融和技术的演讲，中国人在将现代技术整合进手机这方面的成就，非常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需要变得更加有创造力，而他们已经在非常迅速地朝这个方向转变。